

元好问的一师一徒

□郝文柱



“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，郝天挺是元好问的学生”，此句之中的“郝天挺”实则藏有二人身影：一为元好问恩师，一为元好问弟子——世事巧合如此，的确也成金元时期文坛一趣。十四岁少年元好问跟随身为陵川令的叔父初谒郝天挺，先生字晋卿，乃金代泽州名儒。时值崇庆之变，朝纲紊乱，先生两赴廷试却毅然拂袖南归：“时事如此，可区区冒进乎！”其风骨凛凛如松，元好问便在这松荫下开始了学业。

郝天挺祖上曾亲承程颢教诲，传教子孙，形成家学。叔父人京师太学，归乡后指授学者，门徒众多，在人品、学问等方面对郝天挺影响极大。此老“读书不为章句、谀学、宦学”，重视内在品质修养的培植，郝天挺的教育理念于此一脉相承，“其教人以治经行己为本，莅官治人次之，决科诗文则末也”，最终培育出元好问这一杰出人物。

郝天挺之教迥异流俗，其治学以“通人”为旨归，主张学问当“明理致用，心系苍生”。他摒弃科举功利之风，以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为根基，授弟子以经史大义、家国情怀。他痛斥举子速成之术“幸而得之，不免为庸人”，教导弟子“读书不为艺文，选官不为利养，唯通人能

之”，学生不解，问道：“若依先生之道，岂非科举无望？”先生目光灼然，答曰：“正欲渠不为举子尔！”此言如惊雷，直指读书人立身根本，使元好问终生受用。

元好问在《郝先生墓铭》中记录了郝天挺的谆谆教诲，大致意思是说：今人为科举而学，急功近利，把儒家经典分解成考题演练，以致学生连原文的出处及断句能力也没有，这样科举即使考上，也不免成为平庸之人，然而读书并非为了舞文弄墨、附庸风雅，当官也不是为了功名利禄。郝天挺的这番话振聋发聩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本来教书育人应以德才兼备为本，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往往重才技而轻品格，重功利而轻道义，导致修身践行流于说教，违背国家教育立国的初衷。

元好问人品学问深受郝天挺影响，他还曾写下一段文字：“将侥幸一第，以苟活妻子耶？将靳固一命，龌龊廉谨，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，以取美食大官耶？抑将为奇士、为名臣，慨然自拔于流俗，以千载自任也。”显然是其师“读书不为艺文，选官不为利养”之语的升华。元好问自十六岁参试至三十二岁进士，前后历经八次，屡败屡战。其间，他积极

顺应郝天挺注重品格培养、夯实知识基础、发挥兴趣特长的教学理路，使自己大有所成。元好问多次强调“士之有所立，必藉国家教养、父兄渊源、师友讲习，三者备而后可”，流露出对恩师的感激之情。

岁月流转，金戈铁马踏碎山河。元好问在颠沛流离中辗转，及至中年竟又遇一少年，名亦郝天挺，字继先，号新斋，安肃州人。继先乃蒙古国勋臣郝和尙拔都幼子，英爽刚直，卓然有志。他执弟子礼于元好问门下，其好学之志，令元好问忆及当年自己立于晋卿先生阶下情景。先生所授“经世致用”之魂，便由元好问之手，悄然融入继先精神血脉之中。继先亦不负师望，后受元世祖忽必烈召见，世祖见其风仪，欣然赞道“宜任以政”。

元好问暮年寓居河南时，继先已远镇云南，任参政事。一日，继先收到师弟郝经（晋卿之孙，亦是元好问学生）寄来的书信，其中提及恩师病中仍惦念昔日晋卿先生的教



书香一品

丝绸之路是东方物产、华夏文明向世界传播的重要途径，其中一条在海上，辽阔而蔚蓝，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从这“一带”孕育。何杰华的《邑以文名：文昌传》（海南出版社出版）系统梳理了四千年文昌的历史文化脉络，全面且深刻讲述了这座“千年古邑”“华侨之乡”“航天新城”的发展，并通过对文昌历史的系统梳理，提炼出这座城的核心气质——积极向往华夏礼乐文明、勇于向深海更深处迈进。

为一座城作传，非常不易。作者选择从城市名称历史沿革的考释入手，从对文昌的古邑名“紫贝”得名原因之考述切入，实属用心。两千多年前，汉武帝在海南岛上首开珠崖、儋耳二郡，紫贝乃珠崖郡之属县。紫贝，本为大海之南的一种水生生物，以之名邑，看上去合情合理，但作为初郡属县之名，最初却更可能是南国纺织文化的核心要素“吉贝”的土音误记，与无关珍珠的“珠崖”、无关趾胫的“交趾”等汉译南国地名一样，都是汉文化关于海洋想象的美丽误会。

从紫贝到文昌，其间的因果也与吉贝有关。开郡不到三十年，汉元帝就罢弃珠崖，原因之一正是官员无度征调苛派。《后汉书》载：“武帝末，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，蛮不堪役，遂攻郡杀幸。”这里的“广幅布”就是吉贝所织。过度征调吉贝布等特产，引发百姓强烈反抗，以至隋唐才在紫贝故地重开郡县，先曰“武德”，后改“平昌”，最后在贞观年间定为“文昌”，此后一千多年再未更易。

丝路上古州城书写首述此地，可谓宜哉。作者何杰华无疑对它的地位、人文领会至深，曾感慨“她立于古之南荒，却名唤‘文昌’”。单是明清两代，这座在当时人口总数不足三万的小城，却有文武举人百余人，进士十六人，“一里三进士”“七里八举人”“四代三举人”“师生同榜双进士”……至近现代，更是名人迭出，人才济济，这座至今总人口仅六十万的小城，是如何做到的？

聆听海上丝路乡音

——读何杰华的《邑以文名·文昌传》

□周泉根



带着这些问题，作者走读城乡的风采、拾撷山川的记忆、品鉴百姓的精气神、求证故事的因果，最终有了这部《文昌传》。书中在论述“更路簿”起源时，先是从古时文昌所遭遇的恶劣生存环境入手，论述文昌人“耕海”的必然，再列举当前能找得到的“更路簿”的编纂时间，分析各个版本之间的承袭关系，既有准确的例证，又有严密的论证，最后将故人和故事、前因和后果全盘托出。

从书中各章题目如“希贤希圣，溪北书香”“舟行南洋，老宅守望”等可知，何杰华要写海岛的乡音、琼侨的乡愁、游客的远方和飞天的梦想。正如在“揽月”章中，作者如此写道：“从前的星空于他们而言，更像是心底无奈的寄托，而现在这份寄托变成非常具象的骄傲了，是家里有喜事了，是过节了。”每次火箭发射时，火箭发射场所在的文昌市龙楼镇，家家户户都会杀好文昌鸡，邀亲戚一起“过节”。当你问龙楼的文昌人看火箭发射的心情时，他们的自豪甚至有些人妒忌——“都习惯喽，天天发”。

这是写生，也是思索，是讲道理，也是述情怀，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百姓的喜悦、骄傲跃然笔端。时值海南自贸港建设红火之际，书中回响的千年丝路上的故音与新声，既让乡愁听得见、看得见、摸得着、留得住，又让乡邑传统人文价值得以提炼、桑梓故园文化形象得以盛装输出，可谓恰逢其时。

霹雳应手神珠驰

——风靡唐代的马球

□段培华

在扬州博物馆，有一面稀世唐代铜镜——打马球纹铜镜。目前，相对完好的这类镜子在我国仅存三面。该镜子背面纹有四名骑士手持鞠仗策马打球的画面，是风靡唐代的马球运动的见证。

马球，中国古称“击鞠”“打球”“击球”，也叫“波斯球”“波罗球”，是一项骑马打球的运动。马球起源至今没有统一认识，早在周代可能就有类似马球的运动。新疆吐鲁番出土过两千多年前的球杆和球，三国时曹植的《名都篇》也写道：“连翩击鞠壤，巧捷惟万端。”有学者认为，“击鞠壤”就是后世的打马球。

唐人对马球的喜爱始于唐太宗。《封氏闻见记》中载：“太宗常御安福门，谓侍臣曰：‘闻西蕃人好为打球，比亦令习，会一度观之。’”电视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，一场马球戏还原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盛况。其实，在唐代二十多位皇帝中，至少有十几位是马球的忠实粉丝。唐玄宗、唐宣宗、唐僖宗等都是此中高手。唐代民谣说：“三郎（唐玄宗）少时衣不整，迷恋马球忘回宫。”宋人也认为沉迷打马球，是唐玄宗误国的一个原因。有一首广为流传的《题明王打球图》：“阖闾千门万户开，三郎沉醉打球回。九龄已老韩休死，无复明朝疏谏来。”唐僖宗球技更高，他曾对身边人说：“朕若应击球进士举，须为状元。”意思是，如果科举进士科考马球比赛，那么唐僖宗自信可以夺得马球状元。

马球不仅是娱乐活动，也有实用价值。打马球时，需要稳稳骑在高速移动的马匹上挥杆打球，挥杆打球和骑兵挥砍作战并无二致，马球技术高的人，骑手自然差不了。所以，在唐代，马球也被用来训练骑兵。唐代诗人阎宽在《温汤御球赋》中载：“伊蹴鞠之戏者，盖用兵之技也。武由是存，义不可舍。顷徒习于禁中，今将示于天下。”唐玄宗也曾颁

布诏书，认为马球运动不能只限于宫廷之中娱乐，要推而广之，以作为军事训练。正因为意识到马球的重要价值，宋代时马球还被列入武举考试项目。在唐代，有的时候，如果军政长官疏于打马球，还会被视为荒废军政，唐宪宗曾因此事责问大臣赵宗儒。

熟悉《水浒传》的人都知道，书中高俅凭借高超的蹴鞠技巧而平步青云。在唐代，高超的马球技术同样可以让人青云直上。唐末，军人周宝的马球技术高超，达到“怀挟星弹，挥击应手”的程度，因为长期无法升官，于是就向唐武宗毛遂自荐，展示自己的球技。唐武宗见他球技高超，就升其为金吾将军，后来周宝逐渐升到镇海军节度使，成为封疆大吏。唐僖宗时，甚至出现了“击球赌三川”的事情。唐僖宗在选拔剑南西川节度使时，候选官员有多位，一时难以决定，就对他们说，举办一场马球赛，获胜者可出任节度使。最终，陈敬瑄拔得头筹，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。唐代皇宫中还有专门陪皇帝打球的人，地方藩镇也会向皇帝举荐擅长打马球的人才，唐代禁军中甚至设置有打球军将、打球供奉。唐朝灭亡前夕，唐昭宗被迫迁往洛阳时，随从中有“小黄门及打球供奉、内园小儿二百余人”。这些马球技术高超的人，大多会得到皇帝的提拔或赏赐。

皇帝的热爱，加上兼具娱乐欣赏与实用价值，马球逐渐成为唐代时尚运动，唐代许多达官显贵爱好打马球。“球惊杖奋合且离，红牛纓挂黄金鞵。侧身转臂着马腹，霹雳应手神珠驰。”在这首《汴泗交流赠张仆射》诗中，韩愈描写了名将张建封组织、参与马球游戏的情形，既写到球队的队形变化、球员击球的动作、豪华的马饰、球飞行的速度，也写到现场欢呼的观众，从中可见唐人对马球喜爱之甚。



唐三彩打马球仕女俑

据考古发掘，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、唐中宗的儿子节愍太子李重俊都喜欢马球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淮南节度使杨渥打球夜以继日，有时为了晚上能打球，让人点上“十围之烛”照明，这种巨型蜡烛一个就价值数万元。不只达官显贵，军中将士爱打马球，由于唐代尚武，甚至普通文人、闺阁女性也有此爱好。唐代文人的球技并不比将士差，按唐朝惯例，每年要为新科进士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，其中一项就是在月灯阁举办打马球活动。按理说，这些皓首穷经的文人很难骑术高超，不过在唐代，许多进士马球技艺了得。乾符年间，新科进士刘覃曾与神策军将士比赛打球，因球技高超而被众人赞叹。

唐代女子也热爱打马球。《明皇击球图》展现了唐玄宗与后宫妃嫔打马球的场景，河南洛阳唐代王雄诞夫人魏氏墓曾出土四件唐三彩打马球女俑。唐代诗文中也有女子打球的记载，王建《送裴公上太原》中写“千群白刃兵迎节，十对红妆妓打球”，张籍的《寒食内宴二首》亦云“廊下御厨分冷食，殿前香骑逐飞球”的诗句。由于马球运动的流行，唐代有很多与马球相关的文物，流传至今的马球、球杆、球场碑石、绘画、泥塑等数不胜数。

由于马球运动强度高，再加上马匹珍贵，除了骑马打马球外，唐代还流行驴鞠和步打。驴鞠指骑驴打球，驴形体比马小，适宜女子和骑术不高的人乘骑。《太平广记》载，宰相李林甫“年二十，尚未读书。在东都，好游猎打球，驰逐鹰狗。每于城下槐坛下，骑驴击，

略无休日”。步打指步行打球，王建有诗曰：“殿前铺设两边楼，寒食官人步打球。”唐代女诗人鱼玄机也爱好步打球，她还专门写了一首《打球作》：“坚圆净滑一星流，月杖轻敲未拟休。”

马球的流行，也曾起到交流媒介的作用。辽代陈及之所绘《便桥会盟图》，记录了唐太宗和东突厥颉利可汗在渭水便桥会盟时，大唐和突厥进行马球比赛的场景。唐中宗时，吐蕃使者迎接金城公主入藏，使团中有马球高手。彼时吐蕃请求与大唐比赛马球，唐中宗派出的选手被吐蕃打败，接着又派出当时还是临淄王的唐玄宗李隆基和嗣王李李邕、驸马杨慎交、驸马武延秀等人再与吐蕃比赛，获得胜利。据《封氏闻见记》载：“玄宗东西驱突，风回电激，所向无前，吐蕃功不获施。”

如此流行的运动自然有较为细致、明确的规则。马球比赛队员分为两队，分别穿不同颜色的服装。为防止比赛时马尾纠缠，赛前要将马尾扎起来。唐代马球有单球门和双球门，如果是双球门，就会设有守门员。判断输赢称为“得筹”，或人一球得一筹。马球有两种判断胜负的方式：一是率先夺筹者胜；二是最先夺得一定数目的筹者胜。如果皇帝亲自参加马球比赛，参赛队员一般不敢先得筹，比赛时要将球传到皇帝附近，由皇帝拔得头筹，正如王建《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》写道：“无人敢夺在先筹，天子门边送与球。”

打马球的球棍叫“球杖”“鞠杖”“月杖”等。马球的球分为皮制和木制，皮制球有拳头大小，“以皮为之，中实以毛”；木制球采用质量轻而有韧性的木料制成，中间挖空，外表涂上颜色。唐代蔡孚的《打球篇》中有“宝杖雕文七宝球”“初月飞来画杖头”之语，可见当时的马球，球杖较为考究。打马球自然离不开好马，适合马球运动的马不在于高大，而在于灵活。唐代有专门用于马球运动的马，唐玄宗时，于闐遣使向大唐进贡两匹马球专用马。此外，打马球要有专门的场地。唐代皇宫中有多处球场，都城长安的靖恭坊、永崇坊也建有球场，有些达官贵人还建有私人球场。马球场的地要求十分平整，唐代诗人杨巨源《观打球有作》写道，“亲扫球场如砥平，龙骧骤马晓光晴”；韩愈的《汴泗交流赠张仆射》诗曰：“汴泗交流郡城角，筑场千步平如削。短垣三面缭逶迤，击鼓腾腾树赤旗。”可见，马球场还应该有几千步大小。

画镜



郝继善 作



明皇击球图（局部）